

时代群像与代际书写

——《范爱农》手稿与初刊本对读及其研究意义

丁文

【摘要】鲁迅在《范爱农》中重写了一位已经被哀悼了不止一次的友人；作品发表之后，鲁迅又在以后的生命中继续哀悼。现存《范爱农》手稿中的字句涂改，展现出鲁迅在反思辛亥革命过程中的思路分权。手稿与初刊本的对读，揭示出印刷定本所呈现的内容，远没有作者思考的内容多。那些最终并没有被采用的修改留痕，构成了与定本平行的“亚文本”，可视作鲁迅有关范爱农主题的未尽之言与有机补充。《范爱农》聚焦于辛亥革命同时代人的命运肖像，对前后两代革命者进行观察与思考。鲁迅关注到了“中间代际”最容易被忽略的生存困境，又将这种特殊性上升为一种普遍性。辛亥革命“中间代际”知识分子的命运，映现了以后时代知识分子生存与精神的普遍困境，其历史性具有未来性。

【关键词】《范爱农》；鲁迅手稿；代际

【作者简介】丁文(1978-)，女，江苏南京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北京 102488)。

【原文出处】《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海口)，2023.2.20~3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朝花夕拾》研究”(19YJA7510008)。

作为“旧事重提”系列的最后一篇，《范爱农》以“早年鲁迅”经历中的末端事件——辛亥革命作为背景，而这一事件对鲁迅作品的整体面貌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有论者指出，“‘范爱农的影子’几乎贯穿了鲁迅‘彷徨’期的写作”^①。有关《范爱农》承载了鲁迅的“民元记忆”^②、寄寓了鲁迅对“辛亥革命及其挫折”的相关思考^③等，学界已有精彩论述。

鲁迅既以个体经验与个人视角来总结辛亥革命，而现存《范爱农》手稿作为“创作草稿”，则包含了“书写中的鲁迅”^④对这一主题思考过程的丰富信息。但以手稿为路径，进入《范爱农》乃至鲁迅辛亥革命书写的相关讨论并未充分展开。现存《范爱农》手稿^⑤是鲁迅寄给《莽原》编辑韦素园的原稿^⑥。文章使用的稿纸是“厦门大学用纸第九号”，朱丝栏，每半页11栏。其样式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藤野先生》所用纸张相似。鲁迅在致韦素园的信中说：自己手头并没有留存《旧事重提》的“草稿”，

他很担心即使寄的是挂号信仍然会“失落”^⑦。据笔者初步统计，这份手稿上共有173处修改。《莽原》编辑根据修改后的字迹，在1926年12月25日《莽原》半月刊第24期上发表了这篇文章。经笔者比对，鲁迅亲手改定的手稿与《莽原》周刊“初刊本”之间基本未做修改^⑧。但原稿上的涂抹、删削、增补等痕迹，在从手写文本转换成印刷文本的过程中被遮蔽了。本文拟从《范爱农》手稿中的修改、以及手稿与初刊本的对读入手，由鲁迅亲手完成将个人思考变成公共读物的文章“轨范”^⑨过程，透视其回顾辛亥革命的独特路径。

一、群传与自传

《范爱农》既以辛亥革命作为一段个人经历的历史背景，但回忆的却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范爱农，这一写法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取径。究其原因，不难看到范爱农是鲁迅辛亥记忆的证人：加速清廷灭亡的徐锡麟案引发了“我”与范爱农的争执；武昌起义

前夕的低潮期是“我”与范爱农在对饮中度过的；“光复后的绍兴”是范爱农拉“我”共同见证的；革命后的新气象中范爱农辛勤做事；一切恢复旧貌，范爱农赞成“我”离开；君子道穷、容身无所则是其溺亡的根本原因。就连范爱农去世十四年后鲁迅“重提”故人的书写行动本身，也源自“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①的历史感觉。可以说，鲁迅所经历的辛亥革命全程都以范爱农为视角。鲁迅“哀范君”的时长延续了22年（1912-1934）^②，作为题材的“范爱农”贯穿了鲁迅文学生涯的始终。对鲁迅来说，“书写范爱农”早已超越了怀念“故人”“旧朋”的层面，而与其“辛亥革命史观”息息相联。

然而，这种“见微知著”式的史观表述有可能因为路径（细微）与主旨（宏大）的悬殊，而呈现为一种表达幽曲、寄意遥深的形态。如果《范爱农》不过是鲁迅“书写范爱农”过程中的一个环节，那么书写的行动与状态本身无疑具有“过程的过程”的意义。相较于单纯探讨印刷“定本”的意蕴，尚处涂改修订形态的手稿，或许为文本辨析提供了另外一重空间。以极度个人化的视角来传达历史观念，这一抵达历史的途径有可能相当曲折。书写者试图强调或遮掩的内容，同样是其史观的有机成分。手稿的未定状态，某种程度上映现出了这一表述过程。在这一意义上，解读手稿对《范爱农》与“鲁迅与辛亥革命”的相关论题来说具有特殊价值。实际上，手稿中的修改正体现出鲁迅的思考，本身就是一种以小人物来感知大事件的私人路径。在叙述“忽然武昌起义，接着是绍兴光复”这句话之后，鲁迅本来写的是逗号，紧接着便是“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但后来将逗号改成了句号。修改后的表述显然更清楚：在交待完历史背景后，再讲述这一背景下的人物活动。但原稿中被修改的逗号，却透露出“我”是通过范爱农“上城”这个举动，来为记忆场域中的武昌起义、绍兴光复等宏大事件进行标注的。范爱农来访，缘于不平常事件的发生，鲁迅正是通过微末的人事来记忆历史剧变。

虽然鲁迅选择了“范爱农”作为回忆对象，却并

未写成一篇“范爱农传”。当通过他人之口、交待范爱农的基本情况时，手稿中本来写的是“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内的字被涂掉，但仍能辨认出最后一个字很像“基”或“年”，因此这三个字很可能是“号肇基”或“字斯年”。可以推测，鲁迅本想补充范爱农的字号，但又去掉了相关信息，避免了为范爱农立传的写法。通过指出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凸显了徐、范的师生关系。

原稿在叙述徐锡麟生平时，本来写的是“正合于谋杀巡抚的地位”^③，但“谋”字被圈去改为“刺”，此句变成“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刺杀”的行动呼应了新闻中所说的“刺客”。实际上，鲁迅的叙述并非电报原文、甚至并非“大意”：在复述电报内容时，鲁迅本来用的是“大意是”，但又将“意”字圈去、改成了“大概是”，意思愈趋笼统。这一改动的目的，是为了将这位慷慨赴义的英雄归入到古已有之的游侠刺客群体中，“刺客”身份与“刺杀”行动前后呼应。这一群体虽然在中国历史中身影模糊，但鲁迅仍然以斟酌语词的方式，将徐锡麟归入其间，为烈士找寻历史定位。

无论是范爱农出场时，不忘将其老师一并纳入，有意拓展成“徐范合传”，还是在叙述徐锡麟为刺杀恩铭所作的一系列准备时，有意将其表述为简约版的“刺客/游侠列传”，都不难看到范爱农身上有徐锡麟的影子。实际上，鲁迅最早称呼徐锡麟为“徐君”，后来才改为“徐伯荪”。徐锡麟的生命虽然结束了，但他仿佛与书写者对面而立，成为隐形的“在场者”；他的影子化作范爱农，始终没有离开文本或历史舞台的中央。表面看来，轰轰烈烈、彪炳史册的“革命军首领”^④徐锡麟，与默默无闻的不遇者范爱农并无多少相似之处。但无论是徐锡麟的艰苦卓绝、坚毅果敢，还是范爱农的办事拼命、耿直不阿；抑或是徐锡麟震动天下、以一腔热血搅动了中国历史变局的发生，还是看人“好为青白眼”、颇具魏晋名士风度的范爱农选择在徐锡麟五周年忌日之后的几天自沉，都可以看到这对师生精神气质上的一脉相承。徐锡麟成了辛亥革命先烈与功臣，他的学生范爱农却成

为革命后转型时代的落寞者,两人以生命长度相联结,共同承载了革命的重担与负累。

如果说“徐范合传”仅仅显现了范爱农命运之“因”,徐锡麟影像中的“刺客/游侠列传”则更指出了此类人物身上久远的历史倒影;而在范爱农周边,鲁迅又设置了一系列的范爱农之“影”。倘若仔细辨析鲁迅与陈子英在横滨迎接的那批新留学的同乡,会发现这十多人其实就是一部“绍兴与辛亥革命”的缩略图。在他们身上浮现出了范爱农命运的三种不同版本。第一种便是“陈伯平烈士”与“马宗汉烈士”。值得注意的是,原稿中本来写的是“陈烈士伯平”,后来才用曲线将称谓颠倒,改作“陈伯平烈士”。“烈士”可以说是范爱农的一种可能性:假如范爱农也参加安庆起义,那么他的生命也将被定格为一位舍生取义、名动天下的烈士。与之相呼应的是第二种版本:人群中还有一两位后来“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革命者,他们可以看作是为革命事业忍受苦刑的坚忍卓绝者范爱农。第三种版本是当时也在人群中的王金发。鲁迅不但没有给他任何特写、甚至都没有提到同行者中也有此人。范爱农与王金发在革命之前关系很近^⑩,王金发在辛亥革命后一度接管绍兴,不久便由穿布衣改为穿皮袍。范爱农倘若有意叙旧并曲意迎合、获取一官半职或许不太困难,王金发可以看作发迹变泰版的范爱农。

其实,陈子英与孙德卿也映现着范爱农命运的另一种样式。孙德卿因担任《越绎日报》“发起人”而被刺受伤;假如范爱农也担任“发起人”,厄运很可能就落到他头上。陈子英和孙德卿在辛亥革命之后均以光复会元老的身份名世,而范爱农则属于革命者行列中被“忘却”的一员^⑪。与此同时,范爱农身边环绕着一批所谓“新进的革命党”:包括革除范爱农学监职位的孔教会会长傅励臣、“拖鼻涕的接收员”朱幼溪^⑫、“柿油党”(自由党)何几仲^⑬等。范爱农的才能虽然远在这些人之上,但正如其自我评价:“弟生成傲骨,不肯钻营,又不善钻营”^⑭。在各类“变色龙”、投机者“顺势而为”、抢占革命后种种机遇的情况下,

范爱农的落魄潦倒在所难免。不难看到,范爱农周边的众人,分别昭示着范爱农的某一种可能性,从而构成了一组辛亥革命“同时代人群像”。此前鲁迅塑造的小说人物吕纬甫与魏连殳也在“性格”上与范爱农有相似之处。^⑮无论是“敷敷衍衍,模模胡胡”^⑯的吕纬甫,还是吞吞吐吐地说出“我还得活几天”^⑰却不得不精神自戕的魏连殳,都可以看作鲁迅对“范爱农型”知识者的生存之道与死亡之路的各种可能性的探讨。

然而,鲁迅不仅仅对范爱农“同时代人”的各种类型与命运做了有详有略地呈现,他还以范爱农为中心,展现出三代革命者的代际绵延,以及三代人之间的师生关系。第一代是以徐锡麟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先烈;第二代是范爱农与“我”为代表的徐锡麟的学生或后辈,在辛亥革命之后为生存苦苦奔波;第三代则是“我们的少年们”,他们“听过我的讲义”,在革命后以办报的形式对政权进行监督。以往论者多注意到《范爱农》中的“同时代性”,但对众多人物隐含的不同代际则讨论得还不够充分。实际上,鲁迅正是立足于范爱农与“我”所置身的“中间一代”,对于此前的徐锡麟一代与此后的“少年”一代进行了观察与审视。学界往往注意到了鲁迅对徐锡麟一代的敬意,但对这种敬意背后的复杂性及其表述过程却少有涉及。同样,“中间一代”对于“少年们”的态度,也与鲁迅写作《范爱农》时身处的1926年前后的文坛纷争密切相关,而对这一点同样探讨不足。

要说清楚“中间一代”对“师者代际”与“学生代际”的复杂态度,还需要看到作为“群传”的《范爱农》在广度上以个体展示同时代群体、在深度上将一代人与其前、后代际进行勾连的同时,传记书写者鲁迅也是一位贯彻首尾的传主。《范爱农》既是“他传”又是“自传”。鲁迅以“范爱农”为视角,串联起自己从留日时代到民初北京的经历。“我”与“徐君”“范君”、陈伯平、马宗汉、王金发、陈子英、孙德卿等人在同一历史时空中的交集或合影,构成了文章的内在结构。“我”与范爱农的交往阶段,成为鲁迅划分个人经历的线索。手稿中出现的“在东京”“在绍兴”“在南

京”“在会馆”(北京)这几个地点成为书写者整理记忆、划分阶段的依据。而除了“在东京”与“在会馆”是初次书写时便出现的以外,“在绍兴”是在原文右侧添加的^②,“在南京”则被改成“到南京”^③,手稿最初写成“在南京”,透露出“在某地”与某一生平时段直接对应的关系。

鲁迅不仅将具体地点作为记忆的线索,并且对地点的属性相当敏感。手稿多次表现了鲁迅对留学中“客”居身份的自觉:无论是开篇出现的“客栈”/“客店”(本来写的是“客栈”,后改为“客店”),还是强调一行人所坐的火车为“客车”(“客”字是在右边添加的,原来的“在车上”改成了“在客车上”),透露出紧张的异乡意识。当描述“我”与范爱农在故乡重逢时,原稿中写的是“我□□故乡□□□”,这五个字虽无法辨清,但前两个字类似于“回到”,后面三个字则应是描述当时我的职业,这五个字后被层层涂抹,改成了“我在故乡做教员”。鲁迅将“回到故乡”这一从杭州到绍兴的空间移动,改成了“在故乡”,与前一阶段“在东京”(在异乡)形成隐隐对照。

鲁迅之所以如此强调地点的主/客属性,源于“在故乡”意识的对面,牵连出的是“在异乡”/“在异域”背后的国族意识。鲁迅与范爱农之间最初误会的产生,便与鲁迅的客居身份与国族意识密切相关。当鲁迅叙述日本海关关吏拿起绣花弓鞋仔细端详时,本来写的是“我就很不满”,但后来将“就”字涂掉,旁边又写了一个“就”字也涂掉了,最后改为“我很不满”。原稿中,因日本人端详绣花弓鞋,引起“我”的“不满”这一因果关系是清楚的,即便在回忆中这一心理过程也十分清晰。但将“就”字删去却有意阻隔了这种因果关系,书写者不愿把自己的心理变化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当标志性的“国粹”被外国人看见时,“我”本能地激起了羞辱感,但这暴露的是“我”的心理状态。鲁迅去掉了“就”字,隐藏起了前因后果,旋即把镜头/矛头转向“范爱农们”:通过交待“不满”的原因——“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把“自我”迅速隐没于“一大堆”人之中。在由徐锡麟、范爱农、陈伯平、马宗汉、王金发等人组成的

“这一群”中,鲁迅特意凸显了“我”“茫无所知”“摇着头”的状态与举动。手稿中“说起来也惭愧”与“摇着头”这两处都是添加的,这显然是一种事后的视角。当“茫无所知”的“我”穿越时空、再次登上1907年那天从横滨开往东京的列车时,“我”的自以为使这组被定格的“辛亥同时代人群像”瞬间鲜活起来,回忆赋予了他们生命,但自审却需要勇气。鲁迅正是通过自始至终的“我”对“师”“生”两代革命者的观察与思考,以及对自我的解剖与嘲讽,确立了范爱农一代的历史位置。

二、“中间代际”的意义

鲁迅对1907年来到横滨的“十多人”称谓进行过反复修改。对当年情境的描绘是全文中修改最多的段落,如何形容这群人的身份,使鲁迅颇费周折。关于这“十多人”,鲁迅在修改中加上了一个形容语“一大堆”。在描绘“不料这一群文士们在车上让起坐位来了”时,“文士们”三字被圈去,改成“读书人”,此句又改为“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了”。对这群人的命名总共斟酌了三遍:第一遍是“然而那群□□人物中就有范爱农”;第二遍是“然而那群雍容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第三遍又在旁边加上“揖让”二字,改为“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最后又说“将他们照平常人一样运上东京了”,后将“照平常人一样”六字圈去,此句改为“摇着头,将他们运上东京了”。在一个多月前完成的《藤野先生》中,鲁迅把“清国留学生”头顶盘起的辫子形容为“富士山”,这些人的辫子与范爱农一行行李中的绣花弓鞋,构成了从“头”(辫子)到“脚”(缠足)的互文关系。

即便时隔多年,鲁迅在描述同阵营的革命者(包括师长与同辈)时,除了敬意之外,并未避讳他们身上的瑕疵。这群后来做出了惊天动地事业的绍兴同乡,在鲁迅的回忆场域中是以“有瑕疵的英雄”形象登场的。原稿中被涂去、被修饰的“文士们”“雍容的人物”,同样是鲁迅对其态度的重要方面。尽管这两个词后来分别改作“读书人”与“雍容揖让的人物”,从暗含讽刺变得趋于中性,讽刺性减弱了,但基本感

觉并没有变。这种蕴含在总体印象中的嘲讽态度，并不仅仅只有欲扬先抑的修辞功能：即通过捕捉他们步至历史舞台中央前的一瞬间，强调了这群由传统士人演变而来的英雄豪杰的历史属性。

鲁迅的嘲讽态度，更显现出书写者对自我独异视角的保留。无论是当年还是事后，鲁迅始终没有忽略这群同乡知识分子身上的传统痕迹。如果说当年的“我”无从知晓这群人日后的功绩，那么当鲁迅写作《范爱农》时，他们作为辛亥革命功臣的历史地位已经被定格。但鲁迅仍然为一双绣花弓鞋、他们在车上因让座而跌倒的可笑姿势保存了写真。手稿中的修改留存了书写者的复杂心态。原稿写的是“这一群文士们在车上让起坐位来了”，修改稿则变成“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了”。“又”字的添加并不合理，因为“让座位”这个动作此前并未出现。鲁迅的修改折射出在心理感觉上，类似的繁文缛节从未停歇、一直在重复，由此透露出对传统士人积习的厌恶。在鲁迅眼中，革命者并不是只有单面相的革命，革命者首先是具有多元侧面与复杂性的人。鲁迅对这群人物命名的拿捏不定，显现出定义其历史属性时的困难。在原稿中，鲁迅曾统称他们为“平常人”，这显然是一种反讽，目的是为了强调这群外表普通的人物绝非“平常人”，但后来又将其一名称删去。^⑩

在这群人身上完整保留了鲁迅特别敏感的历史惯性。就连名震天下的徐锡麟，如果他也在这趟摇晃的列车上、而不是提前走陆路到了东京，难保不会因为“揖让未终”而跌倒。在作为政体变革的辛亥革命洪流中，鲁迅将关注点放在了比政体变革更难实现的“人”的精神层面的传统遗留上，革命者身上的旧痕残余首先是其解剖的对象。然而，鲁迅一方面嘲讽了传统积习与惯性，另一方面却在客观上“分享”了积习所直通的身份。当年日本关吏端详绣花弓鞋引发“我”的耻辱感，多年后询问范爱农，方才得知他不过是以学生身份为师母搬运行李。不难推断，关吏的盘查同样引发了范爱农的羞辱，同时他还要承受来自同乡鲁迅的轻蔑。无论是范爱农还是

“我”，都只能佩带起“缠足者的后代”这一标签。这与鲁迅称呼那些头顶盘着大辫子的留学生为“富士山”，但自己在赴日约一年后的1903年3月方才剪辫、本人就有一个诨名叫“富士山”^⑪是相似的。鲁迅对历史暗影的关注，也是在凝视自己身上的历史瘢痕。

不难看到，“我”所处的代际，对徐锡麟一代其实是崇敬与批判并存的。手稿中的修改，显示出鲁迅对批判意识做了弱化，但这种审视的态度本身却没有变化。而在处理“我”所处的代际与“学生一代”的关系时，文本内部则形成了一种隐约闪现的对应，而手稿修改则有意强化了这种对应。鲁迅有意识地描画出“少年们”与“我们”在革命方式上的相似度。“少年们”以开会决议的形式来决定王金发送给报馆的钱能不能收，原稿写作“我们的少年们便开会议”，后改为“我们的少年们便开起会议来”，对“开起来”这个行动进行了强调。这与东京留学生“秘密地开一个会”“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的反复开会之举形成了对照：两代人均以“开会”作为革命的主要形式，这种重复与延续本身便值得玩味。

同时，三代革命者均有“慷慨”的特征。徐锡麟一代以实际的革命之举诠释了何谓“慷慨赴死”，但鲁迅从未在他们身上用过“慷慨”一词，因为“慷慨”是他们生命的姿态，无需明言，语词的添加反倒多余。“我”与范爱农作为他们的后辈，“慷慨一通”是对留日学生们在各种会议上的“言”/“行”的总括，具体说了什么不太重要，慷慨陈词、将语言作为革命的主要方式便是这代人的重要特征，各种辩论、争吵都可囊括其间。革命在他们那里开始流向了一种语言的狂欢。而“我们的少年们”的“慷慨”则表现为在劝别人“为社会”时“慷慨地说”。无论是痛斥军政府、请自己的先生出头担任“发起人”，还是收下当权者赠予的款项时的干脆、收钱后继续“骂”的“决议”，没有一桩举动不是“慷慨”为之。三代人的慷慨姿态是相同的；更准确地说，是一代比一代“慷慨”。但实际上，已经从实践“慷慨”转变为义理“慷慨”，“慷慨”度增加反映的是革命过程中利己性对利他性的覆盖。

鲁迅意识到了后起的革命者身上的某种狡黠特征。当“一个少年”对“我”说“我们知道你决不推却的”，这句话已经剥夺了对方的选择权、甚至包含迫其就范的意味。而令“我”更为心惊的是，少年们所沿用的逻辑——“我们”是群体，“你”是个体，个体服从群体，少数服从多数，恰恰是“我”这代人曾经采用的。当年东京同乡会上“居多数”的一方使范爱农“屈服”，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但“我们”当时并不认为这样做有何不妥；不但如此，还因此痛恨范爱农作为少数者的不合时宜、务必除之而后快。文本前后的映照，反映出鲁迅对于革命中“正义的邪恶”的警觉。

实际上，“学生代际”对“我”的利用、给“我”造成的错愕，其程度并不亚于当年徐案传到东京，留学生们“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时的震惊。在手稿中，在写到“少年们”监督王金发政府的报纸创刊时，原稿用的也是“五天后便见报，辟首便骂军政府和里面的人员”。1907年的“辟头”之感与1912年的“辟首”前后呼应，显现出“我”被公布为《越铎日报》“发起人”时的心理震荡。“辟首”后被改写成“开首”，震惊感有所减弱，但原稿展现的鲁迅的心理状态却值得重视。两个事件的性质虽有不同，但造成的冲击程度相似。“我”在被“学生代际”利用后，深感苦涩却无从告语。“学生代际”作为继起的革命者，在很多方面继承的恰是被革命对象的思维方式。《越铎日报》不仅骂“军政府”，还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姨太太”之后的省略号包含了丰富的含义。军政府不符合预期，王金发的姨太太便要连带挨骂，这种手法可称作株连，而使用这一手法的正是“我们的少年们”。这一情形与王金发放出威胁的口风，“第一个着急的是我的母亲”如出一辙。事件的无关者因为某种私人关系而受到连累，而采用相同手法的是两股不同的政治势力。无论是“学生代际”还是其革命对象（专制政体及其精神财产）与监督对象（革命政权军政府及主政者），三种力量以一种前赴后继的方式承袭、维护了同一份精神遗产：专制主义的精神资源。三种力量两两对立，后者者以克服

前者为目标，但仅限于权力层面的颠覆或制衡，对前者的精神遗产则未加清理地原样接收，“学生代际”成了被革命对象的精神继承人。

这种继承关系又是以一种革命的逻辑展开的：无论是革命政权颠覆专制政体，还是监督者以批评的姿态对革命政权进行监督，正义性与合理性毋庸置疑，但正义的旗帜却成为革命之“恶”的保护伞。正义的旗帜越宽大，革命之恶就可能愈发深邃难察。少年们抬出的“为社会”可谓绝对正义，但无论是对让“我”担任“发起人”的劝说，还是“我”提出不该收王金发钱时极有可能受到的“不肯为社会牺牲”的“质问”，都包含一种不容置疑的优越者逻辑。继起的“学生一代”的狡黠性体现在，他们知晓如何充分利用这种逻辑来达到自身目的。他们告诉了“我”另两位发起人是谁，却没有说出他们的答案。而在被单独问询的情况下，“我”也无从与他人商量应对方法。手稿中，两天后的传单上“发起人是诚然是三个”中的“诚然”是后加的。“诚然”的意思是当然、肯定。这句话隐含一个判断：即这三个被指定的发起人中不可能有人拒绝，因事实上无法拒绝，一旦拒绝有人拒绝会沦为笑柄。“少年”单独问话的方式，显现出优越者逻辑与绝对正义如何通过一种凌迫的形态赢得效力：即“我们”只问“你”的态度，个体须服从群体，个体为群体付出牺牲是理所应当的，哪怕个人将为此付出的牺牲再大。然而，提出这种不平等条件的却是具体的个人——“一个去年听过我的讲义的学生”，“我”最终没有拒绝。手稿将“我答应了”改为“我答应他了”，隐藏着这样一层用意：即“我”并不是答应这件事，“我”只是答应这个人。事件本身隐含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手握权力的是掌握报馆舆论的“学生一代”。他们想借助师长的名声、对任何他们不满意的人事进行攻击；而被借名的师长本人却被“为社会”这一口号压制得无法动弹、作声不得。然而，双方又是师生关系，“我”将不得不答应的被压制的局面，转化成先生答应学生的请求，透露出鲁迅将学生代际对“中间代际”压迫情境做了勉强遮掩。

尽管将这一压迫模糊化了，但鲁迅仍然试图在

手稿中的修改中显现这种不平等的情境。“我”不再劝说报馆会计,理由是一旦再劝,“或者明天在报上就可以看见我怎样怕死发抖的记载”。这句话的原稿是“或者明天在报上即可以看见我怎样怕死的□□记载”,“怕死”在修改中被夸张为“怕死发抖”。这种预想中被修饰得越发可笑的自我形象,源自对少年将对“我”展开猛烈攻击的确信。《范爱农》中的“中间代际”与“学生代际”的矛盾,叠加了这一时段鲁迅被青年背叛的痛苦经验。《范爱农》写作之际,鲁迅刚刚读到了高长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式指掌图》一文,痛感文学青年“吸血”行为的“恶毒”^③。眼前高长虹对自己的猛烈攻击,唤起了民初鲁迅在绍兴时被“学生代际”架上舆论风口的记忆。《范爱农》中复现的民初绍兴鲁迅的惊愕与无奈,融入了鲁迅的现实体验。而鲁迅在沉默了近一个月之后对高长虹进行反击^④,也可以视作对“学生代际”进行历史反思后的实践。

值得探讨的是,书写者对于自身所处的“中间代际”同样进行了无情的审视。“中间代际”以“我们”这群东京留学生为代表,他们关注辛亥革命,属于革命阵营,但参与革命的方式却是“一起来就看报”。虽然急于获取来自祖国讯息的迫切心情不难想见,但这一切都是在安全的环境中进行的,直至“起床一看报”的规律作息被一条电报打断。1926年11月18日,身处厦门大学的鲁迅描述近二十年前(1907年7月6日之后某日)东京本乡一丁目中越馆的一群留学生,得知徐锡麟刺杀恩铭的消息时,眼前立刻浮现出的是这群近二十年前、千里之外的旁观者“容光焕发”的神情:“大家就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这句话后来才被补充为“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原稿显现,那种“容光焕发”的印象仿佛就在作者眼前,一直挥之不去,以至于一写到徐案的发生,那种“容光焕发”的表情立刻涌现出来。在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道义大旗下,革命者做出了刺杀的壮举,接下来将面临惨烈的牺牲。被革命大旗的正义性所包裹的刺杀行动的刺激,使“我们”原本平静的生活突然充满动能:“相互告语”、研究刺客的身

份、姓名三个汉字怎么写、筹备各种会议。如果说定稿体现出了鲁迅对留学生群体心理过程的线性还原(先愣住、然后才“容光焕发”),原稿却显现出回忆者对事件的刻骨印象。当他人为革命事业做出壮举时,并未从事任何实质性工作的“我们”变得活力焕发。虽然同属革命者阵营,但留学生的实际作为却是无所事事,甚至颇为无聊的。而在描述秋瑾被杀与徐锡麟被挖心的消息传到东京后,原稿本来写的是“人心就更愤怒”,但修改时把“就更”二字竖着涂掉,加了一个“很”字,改为“人心很愤怒”。

回忆者一开始叙述的是“更愤怒”这一比“愤怒”更高一级的状态,但“更愤怒”是不能多加推敲的。这牵涉出了一个潜在的判断:即假如徐锡麟没有被挖心、食心而只是被砍头,或是秋瑾没有被执行当时已被废止的砍头酷刑而只是被枪毙,人心的愤怒程度会有所降低。这个没有被明言的判断又是成立的。据1907年农历六月十八日《申报》第三版电报:“浙江留东学生,以徐锡麟剖腹挖心,不合法伤,公电江督严词诘责”^⑤，“剖腹挖心”的确是电文的指责重心。群情激愤的引爆点,是革命者不仅牺牲了,而且牺牲的方式至为惨酷。这是东京留学生们怒不可遏的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原因。他人在践行自我心中革命理想时付出的肉体巨痛、以及一点点被切分、被嚼食的肢体,激起了一群神经麻木者的智力活跃。回忆者在书写过程一开始便无意触碰到了历史的深层肌理,但真相实在太过残忍,以至于回忆者不得不在修改中对这一隐藏的事实进行遮蔽。

远在东京的留学生们“人心”之怒,是由徐锡麟被挖出、被“堂食”^⑥的“心”惹起的。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与徐锡麟的关系可谓“心”“心”相印、以“心”易“心”:革命者付出了失而不可复得的实心之后,“我们”被煽起了愤怒的情绪。徐锡麟之心成为一种筵席,食心者不仅有恩铭的亲兵,也包括“我们”。“我们”正是因徐锡麟们的牺牲而被激发、坚定了志向,被生成为“中间一代”。

三、革命之后怎样:反牺牲与反叙述

《范爱农》通过“中间代际”对前、后代际,以及对

自身的观察与剖析,映现出自我生存的困境。“中间代际”可谓承上而启下:即受“师者代际”的感召,走上了被规定的路;又被“学生代际”利用和挤兑、被推上了非自愿的路,其生存空间是狭窄、逼仄的。他们亲身见证过“师者代际”的牺牲,又被“学生代际”推举出来做牺牲,牺牲成为他们内(道义)、外(压力)两面面临的夹攻。与此同时,他们还被同时代的当权者威胁、被投机者(“新进的革命党”)排挤。但当牺牲/死亡成为一种召唤或宿命时,“中间代际”却发出了“我还多得活几天”的呼声,范爱农求生的声音甚至在他死亡之后仍然清晰传入“我”的耳际:“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但“中间一代”本身又是对任何代际的普遍困境的写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平庸的,这主要表现为其实践方式是通过语言这一形态。但鲁迅试图传达的则是,“喋喋不休地说”这一语言途径,究竟在革命中起到了何种实际作用。他的结论也相当明显:鲁迅试图指出“言”对“行”没有多大实质性影响。

与这一群体中的“异类”范爱农所说的被听见、被懂得的清晰的“话”不同的是,留学生群体的声音被描述成一种集体噪音,如“互相告语”“慷慨一通”“吊”“骂”、争执不休等,其物理音量比范爱农的“自言自语”^⑧高得多,但内容却是贫乏、重复的。而留学生们的集体“乱噪”^⑨,延续为继起的“几个少年”的“嚷”,革命的手段并没有发生改变。在描述光复后的绍兴时,修改稿写的是“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但原稿中“或者”二字是把原来的“也将”二字涂掉后、在右边另写的。^⑩原稿的意思更为确凿,而修改稿表述得则没那么肯定,但仍然强调了少年的“嚷”与王金发进城之间关系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的“即”字,也是被描过的。^⑪在这句话的改定过程中,“也”字出现了三次:“但也”(“也”字被涂去,改成了“但即使”)、“也将”(涂去)、“也会来”(写定)。“也”字的频繁使用,显现出鲁迅某种“顽固”的结论:王金发进城是必然发生的,少年们的言论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革命仅凭言论

器嚷的形式无法决定时局的走向。鲁迅对集体“乱噪”的嘲讽,表明其反对将革命之“行”转换成革命叙述(“言”)。“我”和范爱农为谁拟电稿意见不合时,“我”提出要请一位“深知烈士生平的人”来拟稿。鲁迅以“改写”旧事^⑫、自扮庸众的方式,凸显范爱农的特立独行。原稿写的是“因为他关系更密切,心里更悲愤。做出来就一定更动人。”修改时,不仅加上了“比别人”三字,又将第一个句号改成了逗号,变成:“因为他比别人关系更密切,心里更悲愤,做出来就一定更动人”。两句话被合并成一句话,“烈士”与“文章”之间由并列关系改成了因果关系。这一改动流露出鲁迅一个悲凉的结论:“深知烈士生平的人”,由于与烈士的关系更密切,心情“更悲愤”,所以,能做出“更动人”的文章。烈士的行动不仅催生了文章,而且激发的情感与文章的动人程度成正比,越悲愤的情感制造出越动人的文章。当活人的生命实践被转化成一纸文章时,人的内涵与价值无形之中被忽略了。鲁迅在“更动人”中的“人”字上用较粗的墨迹描过,而被粗笔描过的“人”字仿佛正是对“人”的重要性的强调。当鲁迅注意到了“愤怒”与“更愤怒”、“动人”与“更动人”的级别差异时,他实际上也提出了一个命题:当革命者的鲜血(行动)被过滤、抽象为某种叙述时,革命很容易流于语词的筵席。

对于“被叙述”的革命的反思,还表现鲁迅对自己擦肩而过的罪行的调侃。在描绘“报馆案”受伤者孙德卿的举动时,鲁迅的笔调相当诙谐:“他大怒之后,脱下衣服,照了一张照片,以显示一寸来宽的刀伤,并且做一篇文章叙述情形,向各处分送,宣传军政府的横暴。”其实,假如鲁迅当时还在绍兴,那么受害者很有可能就是他本人,这种诙谐是反常的。而手稿中的修改痕迹,揭示了这一令人发噱的描述背后的原因。

原稿中“看的人一定以为是带些疯气的风流人物的裸体照片”,被改成“看见的人一定以为是带些疯气的风流人物的裸体照片”。原稿中“看的人”就是鲁迅文本中的“看客”,事件亲历者的痛苦对旁观者来说其实无关痛痒。当“刀伤”结成“刀疤”^⑬,展示

疤痕、遍告亲朋的方式本身是滑稽的。而从原稿“这种照片，现在怕未必还有人收藏着了罢”，改成“这种照片，现在是大约未必还有人收藏着了”可见，语气由不确定趋于确定，反映出鲁迅的观察：牺牲、受害一旦被转化成叙述，牺牲本身将流于无聊。

鲁迅对“中间代际”的自我解剖，呈现出的是所有代际都具有的庸常性，因而具有普遍意义。作为辛亥革命这一历史转型期的“中间代际”，“范爱农之死”隐喻了辛亥革命的未完成性。“中间代际”的艰难道路隐现出辛亥革命并未得以真正解决的难题。与此同时，处在历史夹缝中、遭遇前后代际主客观压制的“中间代际”，他们的求生信念与实践，本身蕴含着一种自发生成的“反对牺牲”的动向。在革命洪流的时间逻辑中，过去与未来交汇处的“今”是暧昧不明的时分，而“中间一代”在革命时序便对应于“今”这一时间。他们延续、传递了已经具有历史确定性的“师者代际”的信念，又为正走向历史舞台中央的“学生代际”提供了种种可能性，唯独其自身属性并不确定，因而最容易被忽略。在这一意义上，范爱农走向死亡的求生姿态本身便是“中间代际”生命实践的隐喻，蕴含了鲁迅对辛亥革命至民初一代知识者历史意义的思考。

《范爱农》有三千多字篇幅描述的是“辛亥革命之后”的情境，涉及辛亥革命之前的部分（1907年同乡会争论）只占七百多字。这篇1926年底的作品从属于鲁迅有关“……之后”的总论题，主要聚焦的是“革命之后怎样”。而以范爱农为代表的中间代际一直面临着艰难的生死抉择。实际上，范爱农与世寡谐的命运早在革命之前便已确立了基调。1907年当“我”和范爱农在同乡会上起争执后，“我”发出了感叹：

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修改稿中则改成：

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

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修改稿将“我”对范爱农的恶感，从“可恶”升级为“很可恶”。“我”的感受也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感受：范爱农身上不迎合的气质很容易令人嫌恶。但这种情况发生在特定的条件之下：即中国“要革命”。修改稿中特意加上了“不革命则已”，目的是为了凸显一旦“要革命”，范爱农将成为最大的敌人，在天下可恶之人中位列“第一”。不难看出，早在辛亥革命未成功之前，革命的对象已经发生了改变。原先民族革命的对象：“满人”与其所代表的满清政权，已经被像范爱农这样同阵营中的异己分子替代了。原因是范爱农发出了与“多数”不一致的声音，而去除杂音则是“多数”的目标，革命者成为革命对象本身便是革命的内在目标之一。

这一切直接导致了随着革命某一阶段目标的达成，范爱农面临被多种力量从不同方向“合力”驱逐的境地。首先是被“新进的革命党”驱逐。进城后的王金发“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而在“许多闲汉”之前还曾有两个字，被鲁迅用墨笔严严实实地涂掉了。其涂写状貌有点类似于对《藤野先生》原先标题“吾师藤野”四字的涂法，并非简单地圈去，而是涂成一个方块。^⑧笔者仅凭阅读手稿无法辨认涂去的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或许可以猜测是“乡绅”二字。这种涂法本身是一种刻意遮蔽，鲁迅不想让自己原先对某一类人群的看法呈现出来。但无论是“乡绅”“闲汉”还是“新进的革命党”，光复后绍兴的主政者王金发被这样一群人包围，其政权色彩之斑驳不难想见。如果说《阿Q正传》涉及到了“闲汉”在革命后的出路，那么《范爱农》则解析了见风转舵型的知识群体（“新进的革命党”）对真的革命者所构成的侵占与掠夺。

周作人回忆录、现存范爱农书信还原出了《范爱农》文本中那些一闪而过的身影。“后任”校长是孔教会会长傅励臣，他还曾给范爱农写信，请其“担任师校监学”，范爱农出曾考虑“为偷生计”“或暂任数月”^⑨。但此事“后来好像没有实现”，直接造成了范

爱农的生计无着,而罗扬伯则被周作人明确列名为一位“新进的革命党”^③,范爱农讽刺其人,“居然做第一科课长,足见实至名归,学养优美”^④,而“拖鼻涕的接收员”名叫朱幼溪^⑤,范爱农讽刺其人“志趣过人,后来居上”^⑥。正是这群唯利是图者受到了王金发政府的任用,对范爱农们的生存构成了威胁。范爱农曾将革命后的时段称作“鸡鹜争食之际”^⑦,这揭示出“革命之后怎样”对革命者来说首先意味着生存困难,而这正是《范爱农》所涉及到的隐蔽而重要的主旨。

而除了被不同阵营的伪革命者驱逐,范爱农还被同阵营的各种人驱逐。这其中,包括本来与其同一阵营的学生。范爱农曾在1912年5月9日致鲁迅信中说:“弟之监学则为二年级诸生斥逐,亦于本月一号午后出校。”^⑧由于其对待学生的严厉态度以及自身性格等原因,在一次食堂饭菜纠纷中,范爱农成为被处罚对象,被撤去了监学职位。除此之外,范爱农还被朋友“讨厌”,最后与其来往的“只剩下几个后来认识的较为年青的人了”。范爱农甚至还被“熟人”驱逐:他所“寄食”的“熟人”是沈复生。^⑨后者虽然曾向范爱农伸出援手、试图帮他找工作,但因家人不同意,最终无法收留范爱农。^⑩从这一意义上,范爱农可谓真正的“孤独者”。

在与同时代人的生存“竞争”中,范爱农与“我”的关系又格外敏感。鲁迅的手稿中显现出两人关系非常紧密。“我”与范爱农甫一重逢,便心有灵犀、相知相惜。鲁迅本来写的是我俩“非常亲密了”,后改为“非常相熟了”;原稿中“我们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后来则补充了“醉后”二字,改为“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原稿映现的是“我”与范爱农的真实关系:疯话平时不说、留待范爱农来了以后就说,两人思想的契合由此可见。鲁迅的修改固然是其一贯的蕴藉文章美学的体现:无论是将亲密无间的关系改成保持必要的距离,还是强调了“疯话”不过是酒后疯言,都避免把“意义说得太清楚”^⑪。但这一修改也显示出,“我”与范爱农是两个主体,试图探讨同一阵营中两位最“亲密”、最“相熟”的个体之间

的生存竞争,则是鲁迅在《范爱农》中触及的核心难题。

表面看来,《范爱农》中只涉及范爱农的困苦,并未提及“我”的窘迫。但手稿中的修改显示出,当“我”与范爱农同时出场时,二人的影像往往会出现重叠。在同乡会上,关于谁来拟电稿,原稿写的是:“结果是我也不做,他也不做,不知是谁承认做去了”,后改为“结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谁承认做去了”。至两人重逢时,原稿中的对话为:“哦哦,你是鲁迅!”“哦哦,你是范爱农!”修改稿改作:“哦哦,你是范爱农!”“哦哦,你是鲁迅!”在这两处修改中,范爱农与“我”的位置是可以随时互换的,“我”或范爱农都可以居于文本的中心位置,二人的形象均透过对方的眼睛映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书写者下意识地使用的“我们”一词来描述二人重逢。原稿写作:“我们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便同时说”,修改稿写作:“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我们便同时说”。“我”带着对范爱农的恶感与其分别了七八年,但在回忆起二人相逢时,却非常自然地用了“我们”,显现出两人的心理距离实则很近。

不难推断,被明写的范爱农的不遇与困苦,折射出的是未被提至文本正面的民初鲁迅的生存忧患。据周作人回忆,因为与“军政分府的王金发部下不大弄得来”,鲁迅曾有报考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的想法。鲁迅曾在“大家公用的没有门窗的大厅里踱了大半天”,最终因“一百多元的薪水”决定应考。如果不是蔡子民的信到了、让鲁迅去南京的教育部,解决了鲁迅的工作^⑫,留在绍兴的鲁迅也将面临与范爱农相似的奔波无着。鲁迅将辛亥革命后“爱农还是那件布马褂,但是做了师范学的监学”这句话全部涂掉了。这种整句删除的情况在《范爱农》手稿中只有两处^⑬,显得颇不寻常。在被墨笔划掉的句子旁边,鲁迅又写了一句话:“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王都督给了我款二百元,爱农做监学,还是那件布袍子”。“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意为“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先是将把人与饭碗并列、接着又把“我”与范爱农并列,修改稿的这种表述略显怪异。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与其说

“我”当上师范学校的校长,不如说“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从主观上,“我”也许不乐意;但客观上,“我”不可能不接受,人要向饭碗屈服。二是校长职位只有一个,“我”做校长、范爱农就做不了、只能做监学。

修改稿的特殊表达,指向了革命后范爱农的生存境遇。鲁迅习惯用衣服的材质来暗示经济地位,范爱农无论是“布马褂”还是“布袍子”,显示出做监学后的经济地位没有变化。与之对比的,是那些“衙门里的人物”,由“布衣”改穿“皮袍子”。但鲁迅并未止于揭示当权者与知识阶层的经济差异,他又进一步揭示出同为知识阶层、同属革命阵营中的范爱农与“我”的经济差异。当两个精神高度契合的朋友,面对有限的“饭碗”时,这种生存竞争是隐晦难言却又客观存在的。“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或“季苇写信来催我往南京”,都是生的信号与隐喻。当生的窄门只容许一人通过时,谁将获得生存权、谁先逃生,实为一桩生死拷问。

在手稿中,鲁迅描述范爱农得知鲁迅被许寿裳请去南京时,态度“很赞成,但颇凄凉”,《莽原》初刊本上也写作“凄凉”,但《朝花夕拾》初版本中却改成了“凄凉”,此后的再版本、三版本也均写作“凄凉”,各版《鲁迅全集》也均用的是“凄凉”。“凉”是“凉”的异体字,意思相同。但“凄”与“凄”却是两个字:“凄”意为“悲痛、悲伤”与“寒冷”;“凄”则包含“云兴起貌”“寒冷、阴凉”“凄凉悲伤”“水流貌”“沾湿貌”“草木盛貌”等多种意思。手稿与初刊本中的“凄凉”准确描述了范爱农“悲痛、悲伤”的心理;而结集后所用的“凄凉”则不够准确。得知相知相契的友人即将获得生存机会,留在原地的范爱农感受到了“顾影凄自怜”的孤独。他并没有说出这层孤苦,但态度的“凄凉”与其说出来的“你快去罢”之后的省略号形成了呼应。手稿中的省略号只写了五个点,后接一个涂改了的句号。句号是一个句子表达完之后所用的标点符号,而在“你快去罢”之后,范爱农的话却没有说出来,只有“我”懂得这种“无声的话”背后的含义,领会了范爱农对我的期待。

在我“决计”要走的背后,是已经作出了生存的排序:先救自己,再救他。这便是这场异常残酷的生存竞争中“我”的答案,也是任何时代或个体的选择。鲁迅既关注到了“中间代际”最容易被忽略的生存困境,又将这种特殊性上升为一种普遍性。《范爱农》虽然聚焦的是辛亥革命同时代人的命运肖像,但这一代人的命运又映现了以后时代知识分子生存与精神的普遍难题,其历史性又贯通了未来性。

四、结语

鲁迅在《范爱农》中重写了一位已经被哀悼了不止一次的友人;作品发表之后,鲁迅又在以后的生命中继续哀悼。这一不寻常的长时段表达,揭示出作为印刷定本的《范爱农》写出的内容,远没有作者思考的内容多。手稿中的修改虽然以字句涂改为主,但却展示出鲁迅在反思辛亥革命过程中的思路分叉。那些最终并没有被采用的修改留痕,既体现了鲁迅的思考过程,也构成了与“定本”相平行的“亚文本”,可视作鲁迅有关范爱农主题的未尽之言与有机补充。

鲁迅强调过“未定稿本”^⑩的重要性,以叶圣陶、朱正为代表的研究者则延续了这一思路,多着眼于手稿所展现的高超写作技巧^⑪,对写作过程所蕴含的思想容量未及探究。笔者在阅读、辨认《范爱农》创作草稿的过程中,并未设定这一写作过程中某一文本的重要性,而是将草稿与修改稿视作平行的文本予以同等关注,并在二者的张力中试图理解书写者在辛亥革命“中间代际”问题上欲言又止的晦涩表达。

鲁迅手稿的价值,绝不仅限于最终被定形的文本形态。如已往的手稿研究者所指出的,手稿作为文本发生的“过程”比“定本”更值得关注^⑫。无论是草稿、修改稿、誊清稿、发排稿乃至重抄稿^⑬等,都有重要的价值。鲁迅的手稿、尤其是创作草稿的书写状态,在揭示作家思考过程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手稿承载着作家“现身说法”的创作展示,可视作解析鲁迅作品的第一手材料,蕴含着鲁迅研究丰富的生长点,应受到充分关注。随着2021年12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78卷本《鲁迅手稿全集》的面世,有

理由期待一系列高质量鲁迅手稿研究成果的涌现。

注释:

①陈方竞:《鲁迅与光复会——〈范爱农〉解读》,《名作欣赏》2010年第10期。

②仲济强:《民元记忆与伦理再造——〈范爱农〉与鲁迅的政治时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1期。

③孙海军:《“辛亥革命及其挫折”的隐性书写——重读〈范爱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4期。

④姜异新:《回归“书写中的鲁迅”——略论鲁迅手稿研究的学术生长点》,《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3期。

⑤本文所引用的《范爱农》手稿,皆来自《鲁迅手稿丛编》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76-89页。下文中不再一一注明页码。

⑥鲁迅:《261120致韦素园》《261121致韦素园》,《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23-624页。

⑦鲁迅:《261019致韦素园》,《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78页。

⑧手稿与初刊本的不同有3处:1.手稿“于是便更坚执地”,至《莽原》初刊本上改为“于是坚执地”;2.手稿“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省略号为五个点),至《莽原》初刊本省省略号改为三个点;3.手稿“这不是股本……。”(省略号为四个点),至《莽原》初刊本省省略号为六个点。

⑨鲁迅:《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35页。

⑩鲁迅:《忽然想到(三)》,《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⑪鲁迅共留下了四个版本的《哀范君》:分别是作于1912年7月22日的原稿(参见《鲁迅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页);1912年7月23日寄给周作人的“改定本”(周作人:《鲁迅与范爱农》,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第86-87页);1926年11月18日完成的《范爱农》中所引的《哀范君》(《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7页);1934年底编纂《集外集》时收入的《哭范爱农》(《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45页)。

⑫引文中出现的着重号均为笔者所加,下同,不再注明。

⑬《安徽巡抚冯煦为徐锡麟案审明定拟事致军机处咨文·附件—徐锡麟所颂告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三十三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档案》,《历史档案》2011年第4期,第11页。

⑭范莲子口述、谢德铤整理:《回忆鲁迅和范爱农》(中),《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第38页。

⑮鲁迅:《头发的故事》,《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85页。

⑯周遐寿:《哀范君》,《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第235页。

⑰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第86页。

⑱范爱农1912年5月13日致鲁迅信,参见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第85页。

⑲参见周遐寿:《酒楼》《孤独者》,《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第163、185页。

⑳鲁迅:《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9页。

㉑鲁迅:《孤独者》,《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

㉒原句为“秋瑾姑娘的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后改为“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

㉓原句为“报馆是在南京后两三个星期了结的”,后改为“报馆案是我到南京后两三个星期了结的”。

㉔此处删改的原因很可能是:他们既非“平常人”、又是不折不扣的“平常人”。但无论是反讽或强调,都无法涵盖这一历史转型期群体的复合属性,因此这一形容词最终还是删去了。

㉕黄乔生:《鲁迅像传》(修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第8页。

㉖鲁迅:《261115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15页。

㉗参见张学谦:《“后五四”时期的青年与导师关系——以1920年代高长虹与鲁迅的争论为线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1期。

㉘转引自晨朵:《徐锡麟、秋瑾就义后鲁迅在日本的态度》,《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11期,第59页。

㉙鲁迅在手稿中原本写的是“给恩铭的亲兵堂食一尽”(“一”字笔者无法确凿辨认,暂且存疑),后改为“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原稿强调的是当场吃光,修改稿改为强调烹调的方式(“炒”)。原稿凸显得是吃得干干净净、修改稿则与《狂人日记》中“狼子村”对待“大恶人”的方式:“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完全一致、形成呼应,鲁迅在白话文写作起点中蕴藏的隐喻意义被逐步具体化了。

㉚周遐寿:《鲁迅的故家》,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56年,第163页。

- ③鲁迅:《随感录·三十八》,《鲁迅全集》第1卷,第327页。
- ③即这句话的原稿很可能是“但即使不嚷也将会来”。
- ③这个字本来写得很像“也”字,后在“也”字第一笔的基础上改成了“即”字。
- ③周遐寿:《范爱农》,《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56年,第231页。
- ③手稿中“尺寸太小,刀伤缩小到几乎等于无”中的“伤”本来写作“疤”,后被补描成“伤”。原稿中的两处“刀疤”都描成了“刀伤”,并加上了形容语“一寸来宽的”。
- ③参见[日]佐藤明久:《发现被涂去的文字“吾师藤野”之后——2011年9月25日后的起点》,瞿斌译,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中国现代作家手稿及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160页。
- ③范爱农壬子三月二十七日致鲁迅信,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56年,第234页。
- ③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56年,第235页。
- ③范爱农壬子三月二十七日致鲁迅信,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234页。
- ④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第235页。
- ④范爱农壬子三月二十七日致鲁迅信,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56年,第234页。
- ④范爱农1912年5月13日致鲁迅信,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第85页。

- ④范爱农1912年5月9日致鲁迅信,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第83页。
- ④范爱农1912年5月13日致鲁迅信,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第85页。
- ④范莲子口述、谢德铤整理:《回忆鲁迅和范爱农》(中),《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第38页。
- ④鲁迅:《250517致李霁野》,《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89页。
- ④周遐寿:《鲁迅的故家》,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56年,第170-171页。
- ④另一处是在“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之后,“再过几年,怕连这也会忘却罢。就写下来在这里。□□”(□内的字迹笔者暂时无法辨认),此句也被全部涂掉。
- ④鲁迅:《不应该那么写》,《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2页。
- ④叶圣陶1965年9月23日致朱正信,朱正:《鲁迅手稿管窥》,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6-217页。
- ④冯铁、周维东:《文学是一个过程——瑞士汉学家冯铁(Raoul David Findeisen)访谈》,《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5年第1辑。
- ④参见乔丽华:《重抄稿的意义——从手稿看鲁迅〈集外集〉各版本的编校》,《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5期。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nuscript and the First Edition of *Fan Ainong* and Its Research Significance

Ding Wen

Abstract: In *Fan Ainong*, Lu Xun rewrote about a friend whom had already been mourned more than once, and he continued to mourn the friend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after the work was published. The revision of diction and syntax in the extant manuscript of *Fan Ainong* reveals the divergent thinking of Lu Xun in his reflections on the 1911 revolution. A cross-reading of the manuscript and the first edition of *Fan Ainong* reveals that the printed version presented far less than what the author had thought. The imprints of those revisions that were not ultimately adopted constitute the "sub-text" parallel to the final version,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Lu Xun's unfinished and organic additions to the *Fan Ainong* theme. *Fan Ainong* focuses on the fate portraits of his contemporaries of the 1911 Revolution, observing and reflecting on the revolutionaries of two generations. Lu Xun heeded the most neglected plight of the middle generation, and elevated this particularity to a universal one. The fate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middle generation" of the 1911 Revolution reflects the general plight of the intellectuals' existence and spirit in the later era, and its historicity has a future significance.

Key words: *Fan Ainong*; Lu Xun's manuscripts; the middle generation